



中东库尔德问题 研究

The Kurdish Problem in the Middle East

敏 敬◎著



中东库尔德问题 研究

The Kurdish Problem in the Middle East

敏 敬◎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 / 敏敬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4
ISBN 978-7-5117-2561-5

I. ①中…

II. ①敏…

III. ①库尔德问题—研究—中东

IV. ①D737.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31387 号

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



出版人: 董明清

出版统筹: 董明清

责任编辑: 董明清

责任印制: 尹 芳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100044)

电 话: (010)52612345(总编室)

(010)52612370(编辑室)

(010)52612316(发行部)

(010)52612317(网络销售)

(010)52612346(馆配部)

(010)55626985(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96 千字

印 张: 18.5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52612349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55626985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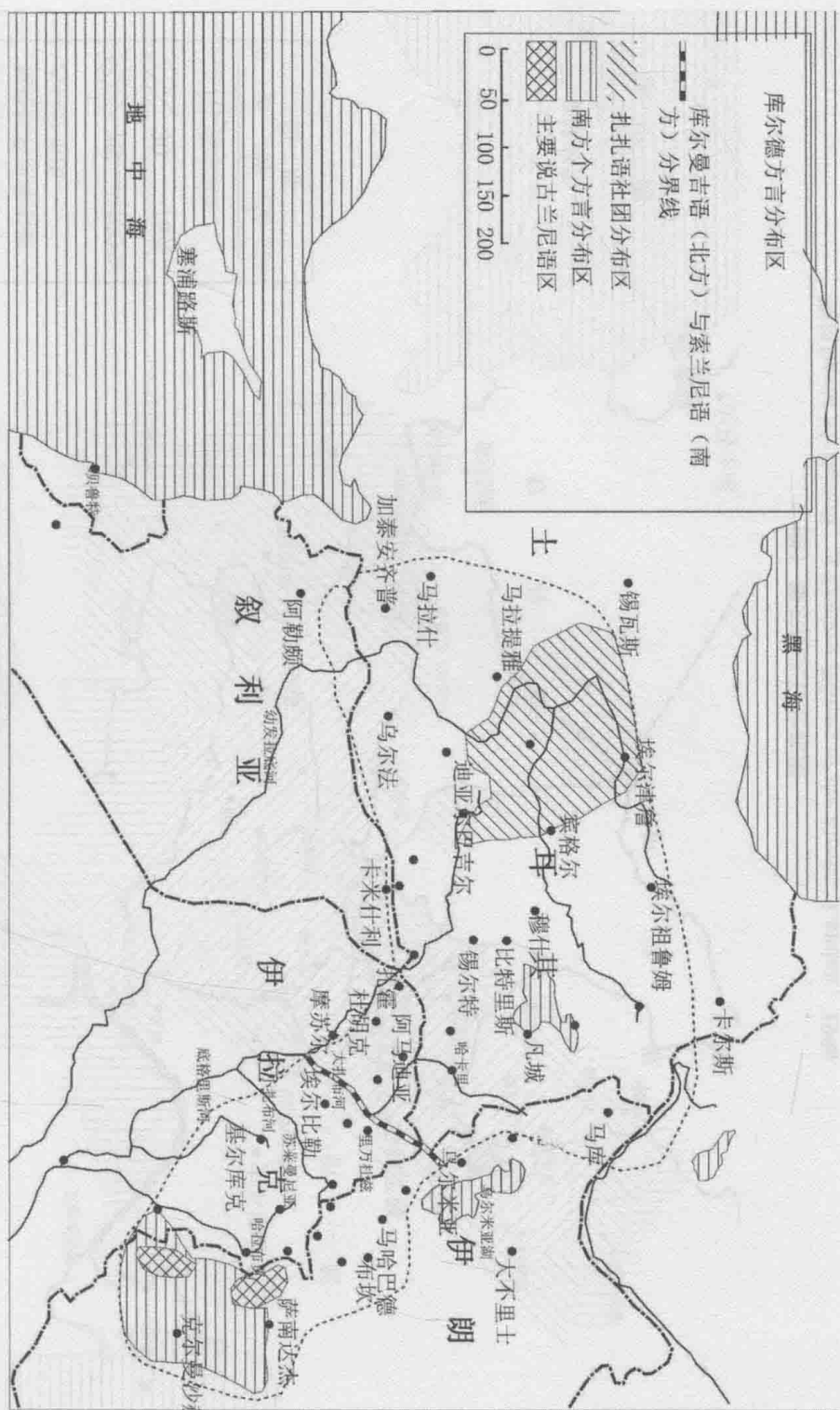


图2 库尔德方言分布图

摘自David McDowall, *A Modern History of the Kurds*, London, 1996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库尔德人与库尔德地区	18
第一节 地理与人口	18
第二节 社会与经济	24
第三节 宗 教	28
第四节 早期库尔德民族主义	40
第二章 土耳其库尔德问题	51
第一节 土耳其建国与库尔德叛乱	51
第二节 族群法律与制度	60
第三节 库尔德人口、经济与教育	69
第四节 库尔德人与民主政治	77
第五节 库尔德工人党与国内战争	83
第六节 方法之争	89
第三章 伊拉克库尔德问题	100
第一节 库尔德人与伊拉克建国	100
第二节 毛拉·穆斯塔法与库尔德民主党	106
第三节 卡塞姆政权与库尔德问题	110
第四节 阿拉伯民族主义与国内战争	117
第五节 复兴党的前期统治	125
第六节 库尔德反对派的演变	132
第七节 库尔德社会与有限自治	134
第八节 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与库尔德高度自治	143

第四章 伊朗库尔德问题	159
第一节 从卡扎尔王朝危机到斯穆科叛乱	159
第二节 马哈巴德共和国	167
第三节 君主专制与库尔德问题	178
第四节 伊斯兰政权与国家构建	183
第五节 库尔德社会与经济	197
第五章 叙利亚库尔德问题	204
第一节 库尔德人概况	204
第二节 法国委任统治	207
第三节 战后动荡与 1962 年人口普查	213
第四节 复兴党统治	219
第五节 21 世纪的危机	225
第六章 库尔德问题与国际关系	233
第一节 土耳其库尔德问题与国际关系	234
第二节 伊拉克库尔德问题与国际关系	246
第三节 伊拉克战争余波	256
结 论	262
附录：伊拉克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党章	274
参考文献	279

绪 论

一、选题缘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地区一直是国际政治的热点地区和新闻舆论的报道中心。中东的热点问题，有些属于短期突发性事件，如人质危机、恐怖袭击、军事政变、边界冲突、政治暗杀等，有些则是漫长的复杂难题，如巴以冲突、黎巴嫩内乱、伊斯兰主义的挑战等，本书研究的库尔德问题即属于后一类型。库尔德问题最早可溯源自 19 世纪的中东改革与革命，它与近代以来中东地区的一系列重大变化有密切关系，但直到 20 世纪后期才开始被外界熟知和关注。

上世纪 80 年代初，一个自称是库尔德斯坦工人党的秘密组织公开向土耳其政府宣战，要求允许库尔德人实行政治和文化自治，并且向政府和平民目标发动袭击，在土耳其国内引发震动。土耳其政府立刻动用重兵进行镇压，库尔德斯坦工人党的暴力恐怖袭击随即演变为游击战争。土耳其的国内战争引起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世界的广泛关注。人们渴望了解作为中东地区仅次于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波斯人的第四大人口集团的库尔德人的文化特点、政治诉求等一系列问题。在土耳其爆发国内战争的同时，邻国伊朗与伊拉克之间的战争也如火如荼。1988 年，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孤注一掷，向两伊边境地区的库尔德游击队发动化武袭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激起了世界人权组织、人道主义者和各国民众的强烈谴责，国际社会基于对库尔德人悲惨命运的同情，开始更加关注库尔德问题。

紧接着 1990 年，萨达姆公然入侵科威特，遭到以美国英国为首的多国部队的猛烈打击。这场以海湾战争命名、“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现代化战争很快以萨达姆的惨败而告终。伊拉克北部地区的库尔德人借中

央政府的势力和权威削弱之机，揭竿而起，与南部地区的什叶派穆斯林遥相呼应，谋求独立，但遭到了严厉镇压，大量库尔德难民逃向邻国。美英随即通过联合国在伊北部设立禁飞区，阻止萨达姆的军事行动，向库尔德人提供安全保护。西方国家开始积极利用库尔德人来牵制伊拉克政府、贬低伊拉克的国际形象，为自身在中东的战争行为和政治战略披上人权与民主的外衣。在库尔德问题公开和大规模受到外部势力干预的情况下，库尔德人与外界的联系加强；西方政府和民众频繁向库尔德人提供道义和物质支持；库尔德政治组织的国际活动空间扩大。特别是禁飞区的设立使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成为了事实上的独立王国，对伊拉克国家命运和中东政治地图以及周边国家切身利益的影响日益显著。因此之故，外界对库尔德问题的报道和研究不断深入。

经过了十多年的围困和打压，美国终于在 2003 年发动最后一击，成功推翻了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在此次战争中，伊拉克库尔德武装配合美军行动，迅速扩张势力，不但巩固了既有地盘，而且完成了对北方各战略要地和大型油田的控制。战后，库尔德人与国内阿拉伯逊尼派穆斯林和什叶派穆斯林就未来伊拉克的国家性质、政治体制、国家结构，以及各派在新政权中的地位、权力及利益分配等问题展开激烈争夺。2005 年，伊拉克终于公布了新宪法，规定伊拉克为联邦制国家，允许北方库尔德地区高度自治，这标志着库尔德人的权势和地位获得了法律承认。

伊拉克战争突显了中东库尔德问题的严峻性和重要性。这是战后中东民族国家体系形成以来，一国少数民族配合外部势力成功推翻本国政府、变更国体和政体的典型案例。它引起周边国家尤其是伊朗、土耳其和叙利亚三国高度警惕，这些国家和伊拉克一样，自“一战”以来长期受本国库尔德人文化和政治认同问题的困扰，深恐伊拉克库尔德问题外溢，刺激本国库尔德人发生骚动，危害国家安全。所以积极未雨绸缪，防范危机发生。事实上，伊拉克库尔德问题已经对邻国和流散欧洲的库尔德人产生了激励和示范作用：土耳其、伊朗和叙利亚库尔德人开始公开庆祝伊拉克库尔德人的高度自治，加紧了反对本国政府的游行示威和暴力活动；一度沉寂的库尔德工人党（简称库工党）重新恢复活动，叫嚣以武力争取土耳其库尔德人实现自治；叙利亚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则重组力量，与阿拉伯反对派一道掀起了反政府浪潮；伊朗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同样提出了自治等类似要求。可以说，自进入 21 世纪以来，受地缘

政治变化的影响,中东库尔德人的跨国联系和集体认同有了显著发展,以至于人们研究库尔德问题除了要注意国别情况,还要关注本地区事态的整体发展。

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变化可能会再次引发中东政治地图的巨大变革。第一次变革发生在上世纪初,主要表现为“一战”促成了奥斯曼帝国的解体和一系列中东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从此,无论冷战期间还是后冷战时期,无论各国的政治倾向与联盟如何变化、国内政局如何跌宕起伏,中东民族国家体系和各国的疆域以及族群结构等基本未变。正是这种民族国家体系的相对稳定,有利遏制了各国的库尔德分离主义,使之始终面临本国政府和国际合法性的双重压力。但是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后,中东民族国家体系有了新的变化的可能。就目前状况而言,伊拉克库尔德地区通过高度自治而成为国中之国。未来,伊拉克究竟是坚持脆弱的联邦体制还是发生分裂,没有人敢对此作绝对预测。假如库尔德人真的有机会实现独立,中东民族国家体系无疑将增添新的成员,还可能引起跨国连锁反应,使本地区陷入持续的动荡和危机之中,给外部势力如美国等插手中东事务提供新的立足点与机会。近十多年来,美国与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已经建立起包括政治、军事和经济合作在内的密切关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越多,其影响当地事务的权力就越大。

目前,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借助宪法赋予的特殊权力在外交领域积极开拓,成为了中东地区新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国际社会与伊拉克的交往,在实践中变成了与伊中央政府和库尔德地区政府的双重交往。由于库尔德自治区与伊拉克中央政府的关系不甚融洽,加之自治区动辄抛开中央政府独立开展外交活动,使中东国际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和微妙。作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除了追求政治自主,还试图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体系。自治区政府大力发展石油生产,公开向外国公司招标,阻碍伊拉克统一石油政策和石油收益分配策略的形成,加剧了国际石油供应市场的竞争,使自治区成为研究中东和国际石油市场时必须关注的新因素。

库尔德问题研究是当代中国中东研究的重要内容。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向来关注中东地区的各项发展。1905、1908年,伊朗、土耳其相继发生立宪革命和青年土耳其革命,给同处半殖民地地位的中国革命者和仁人志士以巨大鼓舞。1921年,土耳其成功击退外国侵略者,赢得了民

族解放战争的胜利，随后宣布建立共和国。中国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一盛况，赞扬凯末尔和土耳其民族主义取得的辉煌成就，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充满信心。当然，由于时代命题、交通和通讯等方面条件的限制，这时候的中国还不可能深入关注中东各国的内部问题，如库尔德等少数民族问题。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中东的交往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1954年召开的印尼万隆会议，大大提升了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政治影响。1972年，中国在众多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下，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不过总体来看，在1949年以后的二三十年里，由于受特殊外部环境、意识形态和冷战格局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主要表现在政治层面，还谈不上全面交往，中国对各国国内问题的研究尤其薄弱。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这一状况有了质的变化。一方面，中国全面调整外交策略，积极与中东国家发展全方位的外交关系；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快速腾飞，与中东地区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中国需要在能源、市场和资金等方面与中东地区开展长期而密切的合作。此外，伴随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也不断上升，不仅要发挥经济大国的作用，还要扮演政治大国的角色。中国的国家利益随着对外交往和经济的深入发展实现了全球化。因此，中国必然会重点关注中东地区的各项发展，包括加强对库尔德问题的研究。

研究库尔德问题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理论价值。库尔德问题的产生与发展几乎与中东民族国家的产生与发展同步，并与民族国家的构建和现代化发展有因果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列强被迫承认或扶持中东国家独立，而唯独拒绝了库尔德人的独立和自治要求，充分显示出西方民族自决原则的虚伪性。独立后的中东国家对外反帝反殖反霸，对内依据近代西方民族理论实行同化主义和大民族主义，将其作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的良药。但是，库尔德问题的存在和发展证明，文化同化和民族主义并非是构建民族国家、强化国家认同的一剂良药。如何在文化和族群多元的社会构建国家认同，仍然是一个重大而新鲜的话题，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当然，导致库尔德问题愈演愈烈，也有各国的现代化运动及其带来的社会利益分化的因素。研究和弄清这些问题，对拥有多族群的发展中国家有借鉴意义。

库尔德问题的发展和演变再次提醒世人：一个族群多元的国家发生裂变，内因固然是主要原因，但外因同样不可忽视。这一点已经通过伊拉克复兴党政权的倒台和库尔德自治区的建立而充分表现出来。外因实际指的是外来干预。早在“一战”以前，奥斯曼和波斯两大帝国就不断利用库尔德人给彼此制造麻烦。“一战”以后，伊拉克、土耳其和伊朗三国常常借库尔德反对派来牵制对手。海湾战争后，随着美英势力的介入，库尔德问题有了质的变化，外部干预改变了伊拉克的政治秩序，使库尔德民族主义势力坐大，引发了人们对伊拉克分裂的强烈担忧。外部干预不仅来自大国势力，还来自非国家行为体。“二战”以后，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无论是欧盟等政府间组织，还是世界人权组织等非政府间组织，都对民族国家的内部事务予以强烈关注和主动介入。虽然在不同时期，不同组织的动机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它们都秉承一定的法律和人权观念，重视保护少数族群的权益。欧盟等有关组织主要从法律和司法的角度，不断向土耳其的库尔德政策施压。世界人权组织则从西方的人权观念和立场出发，向各国库尔德人提供道义和物质援助，并且这种观念正在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显然，在全球化和社会日益开放的今天，一个国家在处理内部族群问题和族群冲突时，不可能完全无视来自外界的意见和看法。如何在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地位的同时，又能够保持与外部世界的良好沟通和互动，是各国政府及政治家应该深思的问题。

二、概念辨析

库尔德问题是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和民族主义的驱动下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所以有必要了解民族、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等基本概念。鉴于学术界目前尚未就这些概念达成普遍共识，故下面只介绍几位有代表性的学者的观点，并辅以作者个人的看法。

（一）民族（Nation）

民族一词是在中世纪西欧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个集合性概念。对民族的认知向来有强调客观性或主观性的两种看法。到了现代，建构主义的定义和方法逐渐占据了主流地位。建构主义肯定民族的客观因素，同时更加强调民族成员的认同和团结意识，认为民族是在共同体集体意识的基础上形成的。如以安东尼·史密斯为代表的族群—象征主义的建构

主义流派,“特别强调主观因素在族群延续、民族形成和民族主义影响中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视‘客观’因素为当然或将它们排除在自己的分析范围之外;而是给予主观的因素如记忆、价值、情感、神话和象征等以更多的重视,并且由此而寻求进入并了解族群和民族主义的‘内在世界’”^①。

著名的建构主义学者、美国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②。在安德森看来,想象并不是幻想,而是殖民地精英基于历史和现实的遭遇形成的关于自身命运的共同看法,这些被认为有共同命运的人群就形成为民族。

英国左翼学者霍布斯鲍姆认同安德森关于民族的“想象”之说,但论述得更加直白,他认为:“事实上,民族根本不可能具有恒久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定义,因为这个历史新生儿才刚诞生,正在不断变化,且至今仍非举世皆然的实体。……或许,我们可用主观标准来取代客观标准,比方说以集体认同或个人认同来判定民族。……若想了解民族到底是什么?只能借‘后设’原则去理解。”而这后设的原则是什么?是民族主义。“民族乃是通过民族主义想象得来的产物。”^③霍布斯鲍姆的观点虽然与安德森有所相似,但它更强调民族概念的动态和主观建构色彩,重视民族主义的主导地位。不仅如此,国家也参与了民族的构建过程。国家和民族主义是民族共同的构建者。所以霍布斯鲍姆建议:“‘民族’以及相应的民族活动,都应该纳入国家体制、行政官僚、科技发展、经济状况、历史情境与社会背景下进行讨论。”^④ 他的看法对考察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尤其有警示意义。

第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来自安东尼·史密斯。史密斯认为,民族是“具有名称,占有领土的人类共同体,拥有共同的神话、共享的历史和普

① [英] 安东尼·史密斯著:《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60页。

② [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分布》,吴叡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版,第6页。

③ [英]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④ [英]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通的公共文化,所有成员生活在单一经济之中并且有着同样的权利和义务”^①。民族尽管可以“想象”,但是“想象”除了基于精英们共同的命运之外,还应该其他的既有元素。事实上,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具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神话传说、历史经验等,并且居住地域也有明显区别。

我国学者宁骚梳理人类族类共同体的发展,认为历史上的族类共同体依次有:部落、部落联盟、部族、民族。^② 所以民族是人类族类共同体的最高发展阶段。宁骚批评了斯大林民族定义的不足,强调了统治阶级政治文化在民族形成中的核心位置。

(二) 族群

在有关民族问题的研究中,族群一词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和广泛应用。笔者认为,族群概念一方面有弥补民族理论不足、纠正近代西方思想界片面强调民族地位和作用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有利于展示人类共同体发展的复杂性和阶段性,便于让人们重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族际特征的客观性。

但在具体使用过程中,许多研究者并不对族群一词作严格的定义,以至很多的论述将族群和民族交替使用,甚至相互代替,容易造成意义和理解的混乱。

霍布斯鲍姆采用间接的方式来帮助人们理解族群。他指出:“在日常生活中提到的族裔特性,往往指的是共同的血缘背景以及世代相传的家系,族群的共同特性与集体认同,便是借由它们代代相传下来。‘亲属’及‘血缘’这两大特性,乃是联系族群团体于不坠的主要因素,同时还能用来排斥不属于这个族群的外人。”^③

我国学者郝时远将人类群体划分为“种族”(race)、“民族”(nation)、“族体”(nationality)、“族群”(ethnic group)四个层次,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族群“既包括‘前族体(former-nationality)’阶段的氏族、部落群体,又涵盖族体(nationality)本身及其内部分支,同时它还涉及

① [英] 安东尼·史密斯著:《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4页。

② 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15页。

③ [英]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2页。

‘后族体和后民族 (post-nationality & post-nation)’ 的群体, 即日益增多的从族体和民族中分离出来的移民群体 (碎片)”^①。郝时远的定义有人类学的意义, 对认识族群来源及其构成有指导价值。但在研究特定民族问题时, 这样的定义又显得过于繁琐。

相比之下, 安东尼·史密斯的定义更加简洁和具有概括性。史密斯认为, 族群是“与领土有关, 拥有名称的人类共同体, 拥有共同的神话和祖先, 共享记忆并有某种或更多的共享文化, 且至少在精英中有某种程度的团结”^②。这一定义强调了血缘和亲属关系, 提到了族群可能与领土有关, 从而避免了将所有特殊文化群体都纳入族群概念的麻烦, 尤其适用于分离主义和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该定义还提到了精英的地位与作用, 为族群在精英推动下向民族过渡提供了思考线索。事实上, 史密斯一直强调族群的政治功能, 指出族群“主要是精英和领袖争夺权力的资源和工具”^③。中国学者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关凯指出: “在族群民族主义运动中, 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秉承族群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现代知识分子——那些族群知识精英, 将族群的神话传说、历史记忆、文化特征和现代性以某种非常灵活的形式巧妙地重新构建起来, 作为强化族群认同、增强族群内部凝聚力的手段, 进而创造出‘新’的族群文化。”^④

这样, 族群与民族的关系就变得清晰起来。首先, 二者有明显的差异, 用史密斯的话说: “民族不是族群, 尽管二者有某种重合并都属于同一现象家族 (拥有集体文化认同), 但是, 族群通常没有政治目标, 很多情况下没有公共文化, 甚至没有疆域空间。民族不一定有主权国家, 但需要在对自己故乡有形占有的同时, 立志争取自治。”^⑤ 但二者又有密切的联系: “民族在族群的世界之外是无法孕育的, 并且除非在以前的族群纽带基础上, 某些特定的民族是不会出现的。……民族就是 (一个或

① 郝时远:《对西方学界有关族群 (ethnic group) 释义的辨析》,《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 年第 4 期。

② [英] 安东尼·史密斯著:《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6 年版,第 14 页。

③ [英] 安东尼·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龚维斌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4 页。

④ 关凯:《族群政治》,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86 页。

⑤ [英] 安东尼·史密斯著:《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6 年版,第 12—13 页。

更多个)比较松散的族群的专业化发展,也意味着族群共同体历史性地起着许多民族的原型和基础作用。”^①这也是族群—象征主义的核心观念。

(三) 民族主义

关于民族的研究,无论客观派还是主观派,均承认和强调民族主义巨大的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影响。宁骚认为:“民族主义是现代民族意识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资产阶级的社会意识形态,它既是各民族资产阶级在要求形成民族国家的斗争中反对民族分裂势力和异族压迫的强大理论武器,也是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在维护民族利益或国家利益的旗帜下奉行的一种官方的意识形态。”^②这种用阶级观点定义民族主义的方法,有利于揭示民族内部的不平等性和政治的阶级性质。但它没有重视普通民众在民族主义中的基础作用,特别无法解释为何在许多欠发达族群中同样有发达的民族主义的事实,甚至无法解释为何在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也存在民族主义的客观事实。美国学者里亚·格林菲尔德在考察民族主义的源起之后认为:“民族主义的惟一基础、唯一条件就是一个观念,无它,便不成其为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一种特别的视角或思想风格。任何民族主义的核心就是‘民族(Nation)’这一观念。”^③史密斯则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为某一群体争取和维护自治、统一和认同的意识形态运动,该群体的部分成员认为有必要组成一个事实上的或潜在的‘民族’。”^④显然,倡导民族主义的“部分成员”,实际就是该群体的精英阶层。一般而言,精英阶层相比其他社会阶层具有更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这是由精英的思想能力、知识水平、自尊人格和自主性等因素所决定的。精英们有丰富的信息渠道,有看待问题的多元视角,对压迫和歧视——无论是思想文化上的还是政治、经济方面的——比普通人更加敏感。再加上知识分子普遍的“逆反心理”,因此容易凝聚和统一在民

① [英] 安东尼·史密斯著:《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6 年版,第 88 页。

② 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6 页。

③ [美] 里亚·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王春华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 年,导言第 2 页。

④ [英] 安东尼·史密斯著:《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6 年版,第 26 页。